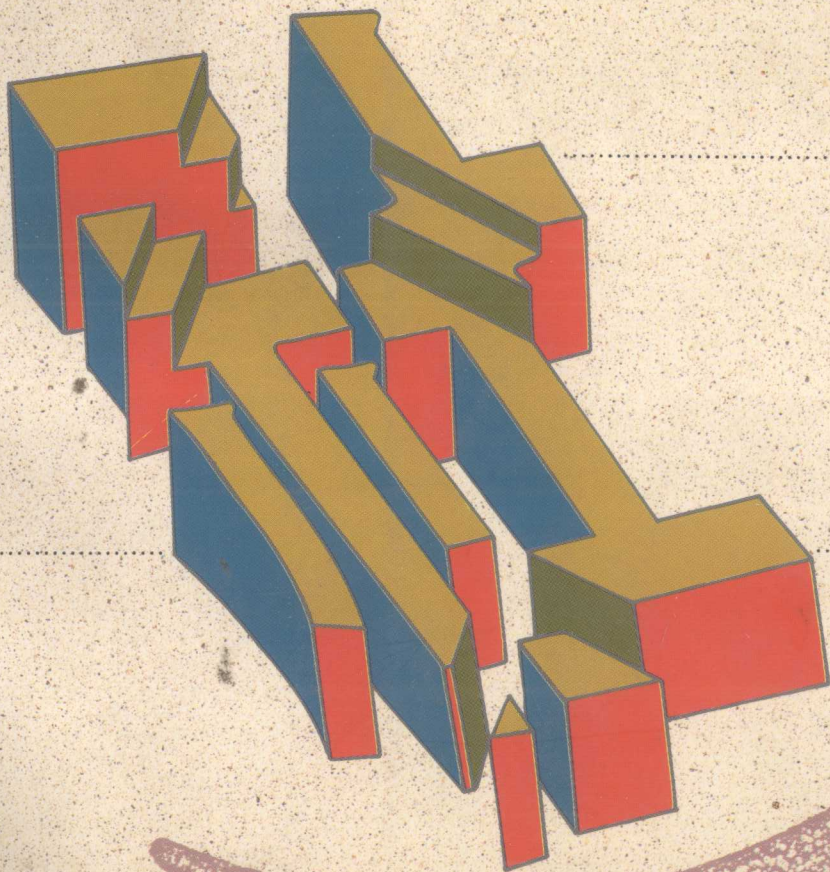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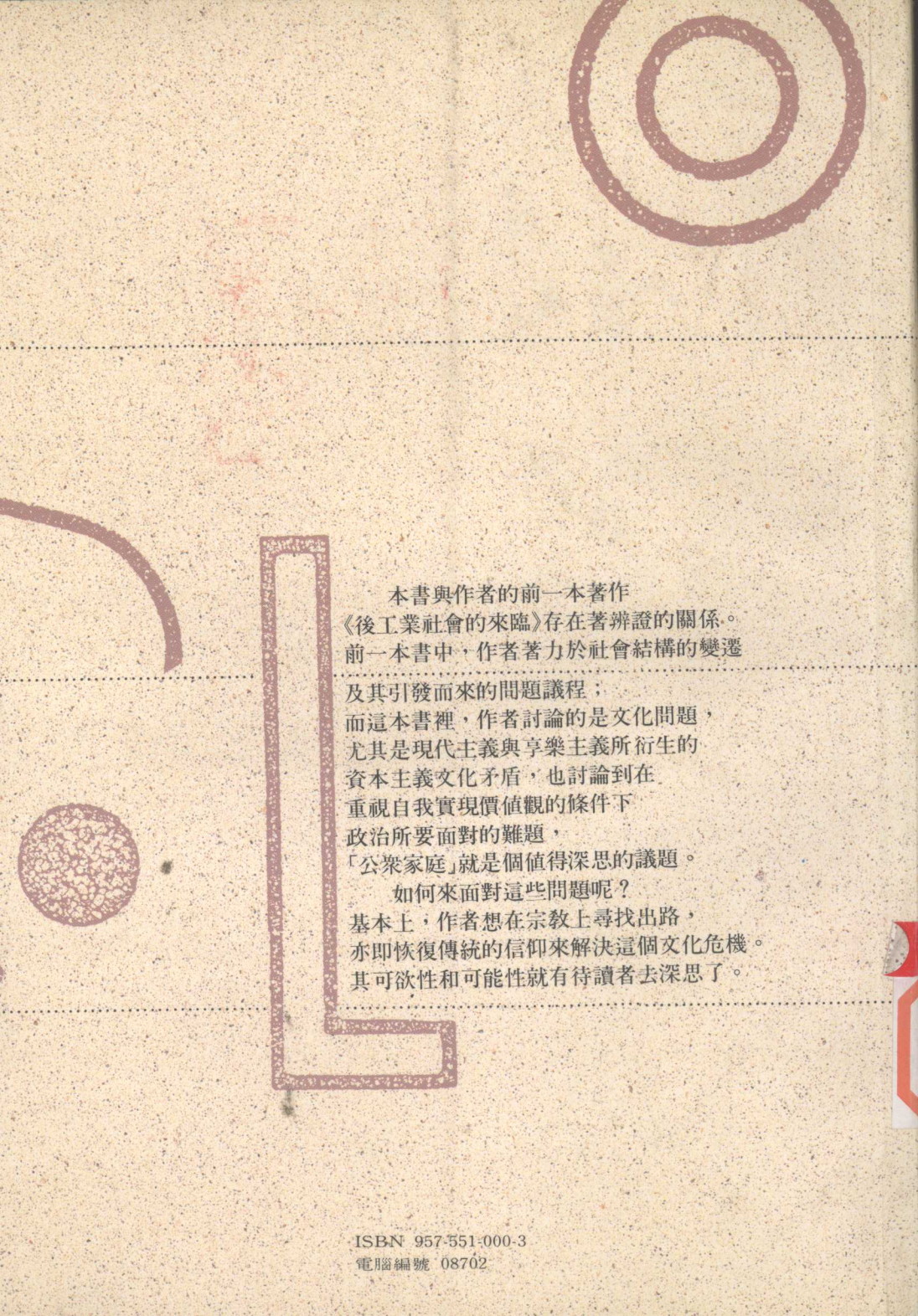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資本主義的 文化矛盾

丹尼爾·貝爾——著
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
林劍秋——校閱





本書與作者的前一本著作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存在著辨證的關係。
前一本書中，作者著力於社會結構的變遷
及其引發而來的問題議程；
而這本書裡，作者討論的是文化問題，
尤其是現代主義與享樂主義所衍生的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也討論到在
重視自我實現價值觀的條件下
政治所要面對的難題，

「公眾家庭」就是個值得深思的議題。

如何來面對這些問題呢？

基本上，作者想在宗教上尋找出路，
亦即恢復傳統的信仰來解決這個文化危機。
其可欲性和可能性就有待讀者去深思了。

G02

20

G02
20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資本主義的 文化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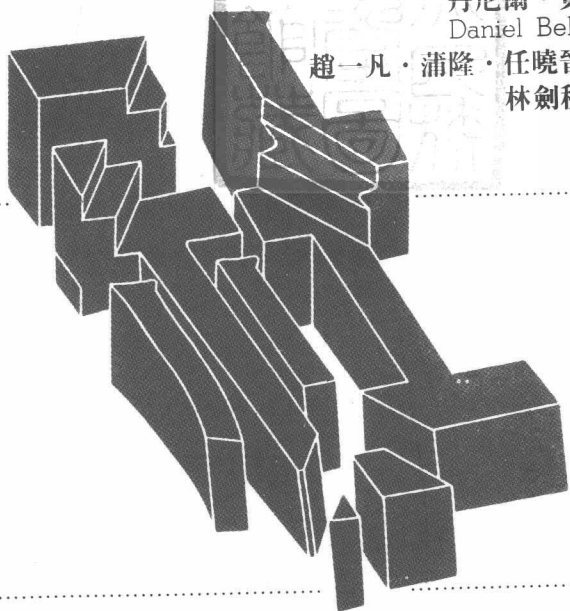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丹尼爾·貝爾——著

Daniel Bell

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

林劍秋——校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②

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原 著 > 丹尼爾·貝爾
譯 者 > 趙一凡、蒲 隆、任曉晉
校 閱 > 林劍秋
執行編輯 > 蔡淑惠
發 行 人 > 賴阿勝
出 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 話 > (02) 368-1118 · 363-1407
電傳 (FAX) > 886 2 368-1119
郵 撥 > 0104579-2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初版一刷 > 1989 年 11 月
初版三刷 > 1994 年 3 月

定價 / 新台幣 300 元

-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51-000-3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從高空中鳥瞰大地，細流小溪、低丘矮嶺渺不可見，進入眼簾的只有長江大海、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在亙古以來的歷史時空裡，人生的悲歡離合，日常的蠅營狗苟，都已為歷史洪流所淹沒，銷蝕得無影無踪；但人類的偉大思潮或思想，却似漫漫歷史長夜中的點點彗星，光耀奪目，萬古長新。這些偉大的思潮或思想，代表人類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也代表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蛻變。它們的形成常是總結了一個舊階段的成就，它們的出現則是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發軔。長江大海和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思潮或思想，刻畫出歷史的主要脈絡。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思想史。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很多傑出的思想家，創造了很多偉大的思潮或思想。這些中國的和思想家，與西方的思想和思想家交相輝映，毫不遜色。這種中西各擅勝場的情勢，到了近代却難繼續維持，中國的和思想家已黯然失色，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道並駕齊驅。近代中國思潮或思想之不及西方蓬勃，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活力日益衰弱，也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動力逐漸強盛。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皆

應深自惕勵，努力在思想的創造上發憤圖進，以締造一個思潮澎湃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思潮或思想交互影響，彼此截長補短，力求臻於至善。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自然不能像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一樣，用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的方式來從事思考工作。要想創造真能掌握時代脈動的新思潮，形成真能透析社會人生的新思想，不僅必須認真觀察現實世界的種種事象，而且必須切實理解當代國內外的主要思潮或思想。爲了達到後一目的，只有從研讀中外學者和思想家的名著入手。研讀當代名家的經典之作，可以吸收其思想的精華，更可以發揮見賢思齊、取法乎上的效果。當然，思潮或思想不會平空產生，其形成一方面要靠思想家和學者的努力，另一方面當地社會的民衆也應有相當的思想水準。有水準的社會思想，則要經由閱讀介紹當代思潮的導論性書籍來培養。

基於以上的認識，爲了提高我國社會思想的水準，深化我國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創造培養新思潮或新思想所需要的良好條件，多年來我們一直期望有見識、有魄力的出版家能挺身而出，長期有系統地出版代表當代思潮的名著。這一等待多年的理想，如今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桂冠圖書公司決定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這個出版單位有感於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及人文精神的薄弱，這套叢書決定以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爲主。爲了充實叢書的內容，桂冠特邀請台灣海峽兩岸的多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工作，最後議定以下列十幾個學門爲選書的範圍：哲學與宗教學、藝文(含文學、藝術、美學)、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含未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等。

這套叢書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人文和社會方面的當代思潮。經過各學門編審委員召集人反覆討論後，我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以來作為「當代」的範圍，各學門所選的名著皆以這一時段所完成者為主。我們這樣界定「當代」，並非根據歷史學的分期，而是基於各學門在理論發展方面的考慮。好在這只是一項原則，實際選書時還可再作彈性的伸縮。至於「思潮」一詞，經過召集人協調會議的討論後，原則上決定以此詞指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學術思想或理論：(1)對該學科有開創性的貢獻或影響者，(2)對其他學科有重大的影響者，(3)對社會大眾有廣大的影響者。

在這樣的共識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包含的書籍可分為三個層次：經典性者、評析性者及導論性者。第一類書籍以各學門的名著為限，大都是歐、美、日等國經典著作的中譯本，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第二類書籍則以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及整合某家某派(或數家數派)的理論或思想者為限，可為翻譯之作，亦可為我國學者的創作，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至於第三類書籍，則是介紹性的入門讀物，所介紹的可以是一家一派之言，也可以就整個學門的各種理論或思想作深入淺出的闡述。這一類書籍比較適合大學生、高中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以上三個層次的書籍，不但內容性質有異，深淺程度也不同，可以滿足各類讀者的求知需要。

在這套叢書之下，桂冠初步計畫在五年內出版三百本書，每個學門約為二十至四十本。這些為數眾多的書稿，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出版單位已根據各學門所選書單，分別向台灣、大陸及海外的有關學者邀稿，譯著和創作兼而有之。其次，出版單位也已透過不同的學界管道，以合法方式取得大陸已經出版或正在

編撰之西方學術名著譯叢的版權，如甘陽、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陳宜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立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等。各學門的編審委員根據議定的書單，從這些譯叢中挑選適當的著作，收入系列叢書。此外，桂冠圖書公司過去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亦已在選擇後納入叢書，重新加以編排出版。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衆多，爲了慎重其事，特分就每一學門組織編審委員會，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術文化工作者一百餘位，參與選書、審訂及編輯等工作。各科的編審委員會是由審訂委員和編輯委員組成，前者都是該科的資深學人，後者盡是該科的飽學新秀。每一學門所要出版的書單，先經該科編審委員會擬定，然後由各科召集人會議協商定案，作爲選書的基本根據。實際的撰譯工作，皆請學有專攻的學者擔任，其人選由每科的編審委員推薦和邀請。書稿完成後，請相關學科熟諳編譯實務的編輯委員擔任初步校訂工作，就其體例、文詞及可讀性加以判斷，以決定其出版之可行性。校訂者如確認該書可以出版，即交由該科召集人，商請適當審訂委員或其他資深學者作最後之審訂。

對於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我們所以如此慎重其事，主要是希望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能具有令人滿意的水準。編印一套有關當代思潮的有水準的系列叢書，是此間出版界和學術界多年的理想，也是我們爲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我們誠懇地希望兩岸的學者和思想家能從這套叢書中發現一些靈感的泉源，點燃一片片思想的火花。我們更希望好學深思的民衆和學生，

也能從這套叢書中尋得一塊塊思想的綠洲，使自己在煩擾的生活中獲取一點智性的安息。當然，這套叢書的出版如能為中國人的社會增添一分人文氣息，從而使功利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則更是喜出望外。

這套叢書之能順利出版，是很多可敬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欣賞的，當然是各書的譯者和作者，若非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必無目前的水準。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各科的編審委員，他們的熱心參與和淵博學識，使整個編審工作的進行了無滯礙。同時，也要藉此機會向高信疆先生表達敬佩之意，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叢書的策劃工作，在實際編務的設計上提供了高明的意見。最後，對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個人也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一向熱心文化事業，此次決心出版這套叢書，益見其重視社會教育及推展學術思想的誠意。

楊國樞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社會學類召集人序

在衆多社會科學中，社會學也算是一門比較新興的學科，但把社會學介紹到中國，卻相當早，大約在本世紀初年。初期中國大陸的社會學者，已經做了一些理論與方法上的譯介工作，雖然不是很有系統，卻也使當時的社會學界獲得許多研究上的便利。

社會學一開始便是以理論取勝的學科，在短短的一百年中，社會學家不知建構了多少理論。用理論解釋現象，又用現象建構理論。我們研究中國社會，雖不一定要用西方理論去作為分析的依據，對已經存在的理論，總不能視若無睹，何況熟悉已有的理論，對研究畢竟有幫助，有時也可以做為研究的概念架構。不同社會的異質性可能很高，同質性也不是沒有。從這一層面而論，了解西方社會學理論，仍然為學術界的必需過程。最好是直接閱讀原文，可以減少許多誤解或疏忽，但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如此，尤其是當學生的時候，直接從中文閱讀，速度和領悟力都要有效得多。

翻譯這套社會學理論叢書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並且訂了幾個翻譯的原則：(1)所有翻譯以理論書籍為主，其中又以古典的和較著名的占大多數，入門書只有很少的幾種；(2)翻譯時盡量增加譯者註釋，以加強閱讀興趣和瞭解；(3)可能時，盡量從著者原文翻譯，並將各種譯文作比較，以重現著作原貌；(4)必要時以主題編譯各種理論為一書，並酌加國人自己著作；(5)有些譯著，希望

由譯者或審查者寫一篇導論或導讀，使原書與現實社會或現今理論有較具體的連接。

選書的原則有三個：一是有的書已經翻譯了或還在翻譯中，我們從原作者和原著確定可否列入叢書，再審查翻譯文字；二是以歐、美社會學理論名著為優先選擇條件，我們選擇一些新起而較受肯定的著作；三是選擇台灣社會學界所熟知而又常用的著作，並及於一般的作品。選書不分理論派別，也沒有主觀的好惡，大致是以著作本身在學術上的成就作為取捨的標準。每一本書都曾經由編審委員圈選，把多數人贊成的著作選出來，然後請人翻譯。

我們希望透過這項翻譯，將使各國主要的社會學理論名著都有中譯本，逐步的做下去，就可能出現若干世界一流社會學家的全集，這對我國社會學的發展，必然產生極大的影響。我們都瞭解，提早認識社會學的各種理論，又是從中文的思考方式去理解，它的直接的衝擊力，總是更為強烈而有效。我們盼望這套社會學的翻譯叢書，能夠產生這樣積極而正面的作用，並幫助建構新的社會學理論。

文崇一

一九八九年序於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中譯本序言

——貝爾學術思想評介

貝爾(Daniel Bell)是當代美國重要的學者與思想家。他在戰後西方的社會學、未來學與發達資本主義研究諸領域據有領先地位。五十年代以來，貝爾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九)和哈佛大學(一九六九至今)擔任社會學教授，參與創辦了在美國社會科學界聲譽遐邇的刊物《公衆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一九七二年全美知識精英普測時，他曾以最高票名列二十位影響最大的著名學者之首。❶近年來，他作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二〇〇〇年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the Year 2000)主席，批判社會學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歐美思想界聲望益高，頗具影響。

一、貝爾的學術思想結構

作為當今美國主要的批判社會學家，貝爾在學術與思想結構上與眾不同。用他自己反復強調申明的話來說，他「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義者」。❷這種「組合型」思想結構已在美國學術界得到承認和重視，並被當作一種典型的「現代思想模式」加以評論。❸但對中國讀者而言，貝爾這種思想傾向可能有悖於傳統區分標準或「非

此即彼」的判斷習慣，從而引起困惑或誤解。因此，若要比較準確地評價貝爾的理論，首要的前提是把握他歷經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三大現代思潮沖擊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相應複雜立場。

貝爾與馬克思主義 貝爾一九一九年生於紐約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家庭，自小隨寡母備嘗艱辛，又處於文化同化的壓力之下（他的家族原姓波諾斯基，後由其叔父改為貝爾），對貧富懸殊的社會差異和不公正的排猶傾向深有體驗。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和革命運動促進了他的思想早熟。十五歲那年他便向拉比宣布他不再信奉上帝，轉而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上街宣講革命道理。像其他後被稱為「紐約文人」的猶太裔進步青年一樣，貝爾一度思想激進，在社會與經濟問題上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這不僅驅使他在大學選擇了社會學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也為他成名之後在同行中博得「精通馬克思」的聲譽準備了條件^④。

然而，貝爾青年時代的激進經歷並未使他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課程及任教初期，正值左翼文化運動退潮，大批同路人知識分子因對蘇聯政策不滿，對國際共運幻滅，轉而擁護羅斯福新政，肯定並頌揚美國民主傳統。四十年代末，以屈瑞林(Lionel Trilling)為首的紐約文人暨《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集團主動引導美國知識界的思想轉變，重建「新自由主義」學術思想體系。作為紐約文人中的後起之秀，貝爾積極地參加了戰後的歷史反省和文化大討論活動，並在總結三十年代左翼運動失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意識形態終結論」(The End of Ideology)，即認為美國與西歐知識分子在放棄了激進理想和社會革命立場之後，普遍地「接受福利國家、權力分散、混合經濟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義上，意識形態的論爭時代業已結束」。^⑤

這一時期貝爾確立了他居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政治自

由主義立場，既繼承左翼知識界對資本主義實施理論批判的傳統，抨擊麥卡錫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⑥又以左翼運動過來人的體驗批評社會主義革命的「烏托邦」傾向，主張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和經濟平等，藉此「為知識界的適度與自尊確立基調」。⑦這種帶有「激進」色彩的自由派「第三條道路」當然同馬克思主義大相徑庭，但持有這種立場的知識分子往往成為從內部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重要力量——貝爾在這一類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貝爾在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社會主義之間的交錯滲透現象有它深厚的文化與種族淵源。身為移民後代，貝爾在青年時代自認是處在美國文化邊緣的「精神漂泊者」。當他同其他紐約文人相繼成名後，又深感「世代流浪，有家難歸」的精神焦慮。⑧猶太思想傳統、歐洲文化背景和俄國革命的感召固然給予貝爾重要的思想影響，美國現實生活的啓示與吸引却又使他獲得與歐洲人不同的比較和批判眼光。這種「身在其中又置之度外」的獨特處境，可以說是導致貝爾懸浮超越意識的主要原因。

五十年代之後，貝爾對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採取「非意識形態化」的學術研究態度。一方面他非常重視馬克思的理論遺產，承認其學說之於現代社會學的巨大影響，並呼籲要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共同探討未來社會制度。另一方面，他在研究發達資本主義演進規律時並不以馬克思為準，而是將其思想同聖西門、韋伯、凡勃倫、桑巴特、熊彼得等人的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理論作通盤比較，各有取捨，自成一家。

例如他近來聞名於世的「後工業化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理論，便批判吸收了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的制度經濟學、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peter)的「創新理論」和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的「新工業國」(the new industrial state)概念。在援用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歷史研究的某些基本觀

念的同時，貝爾却認為「具體資本主義」的現代發展已突破馬克思關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依次更迭的「理論圖式」；而科技發展和「中間階級」（指介於無產者與資產者之間的專家與白領）的壯大將引導所有工業化國家向後工業社會過度。⁹

對此，有些蘇聯學者曾指責貝爾「反對馬克思主義」、「為資本主義辯護」。¹⁰在貝爾自己看來，所有涉及資本主義演變的現代社會學說都是「同馬克思的對話」——既是對話，也就難免爭執、衝突以至背逆。雖然貝爾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持有不客氣的看法，他仍然願意自己被人較為客觀地稱作「後馬克思主義者」，與他的蘇聯同行們一視同仁。¹¹從《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這本專著的批判精神來看，貝爾雖與馬克思多有分歧，他在前人基礎之上追蹤研究，解剖現實，力圖有所創新的意圖確實較為明顯，而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們注意。

從新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 如果說五十年代美國知識界「意識形態的終結」導致過一段基本和諧沉穩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統治，那麼，經過六十年代政治衝突與文化騷動之後，原以羅斯福——甘乃迪改革哲學為軸心的新政聯盟終於在七十年代初宣告破裂，而學術思想領域的新自由主義體系也在內外夾攻下趨於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日益強盛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它越來越有力地支配著尼克森與雷根時代的美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方向。

新保守主義的內容成分相當複雜。它既是針對自由派激進改革綱領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糾正，也反映出美國社會公衆近年來向傳統回歸、尋求穩定價值觀念的廣泛心理。新保守主義者一反六十年代的過激傾向，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提出一系列偏向節制、冷峻和實際的觀點，強調要控制國家干預，鼓勵自由競爭，縮減福利開支，抵制過分的平等要求，恢復道德約束與文化秩序，以

便在日趨嚴酷的局勢下維持美國的繁榮與尊嚴。

這些形形色色的政策、理論和文化情緒之間充滿著矛盾和差異。在被統稱為「新保守派」的龐雜陣容裡，不但有右翼政客、軍方鷹派、宗教領袖、「雷根經濟學家」及種種「美國中堅」勢力的代表，而且包括了一批前自由派學術權威。其中有從紐約文人集群中分離出來的貝爾、波德萊茨、克里斯托和李普塞，以及常在《評論》(Commentary)、《公衆利益》和《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等刊物上發表文章的著名政治家，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莫伊尼漢(Daniel Moynihan)、科帕特里克和諾瓦克等人。¹²

貝爾與這群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智囊」關係接近，交流頻繁，在一定程度上贊同過他們從七十年代初開始的自由派自我批判活動。但他作為素來審慎的「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對政治「新右翼」和具有反智傾向的原教旨主義平民運動一直懷有戒備和疑懼。另外同那些從自由主義轉向新保守主義的學者相比，貝爾既沒有莫伊尼漢、科帕特里克(這二位先後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參政熱衷，又不同意波德萊茨和諾瓦克等人對資本主義「潛在精神力量」的肯定(後者因此指責貝爾的「社會主義思想比例過大」)。¹³甚至當被問及《公衆利益》的「新保守主義宣言」事件時，他申明那「不過是歐文(·克里斯托)一個人的主意」¹⁴——以此與別人拉開間距，保持自己的個人立場。

貝爾之所以反對別人加附於他的「新保守派」標籤，認定這種「單一層面上的排隊毫無意思」，¹⁵這同他歷來嚴肅的思想習慣有關。事實上，他每次應時代之變而調整自己的立場時，都注意到前後連貫，平抑偏激。同時擴大視野，以達到新的均衡——這大約是他有別於其他新保守主義理論家的主要特徵。

回顧他自五十年代以來的思想變化，我們發現貝爾並未遠離他「中間偏左」的經濟社會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儘管他受到了

杭廷頓有關「民主政治危機論」的影響，強調要擺平「自由與平等」的關係。¹⁶當人們在六十年代對他的「意識形態終結論」提出質疑，並批評他過於排斥理想主義時，貝爾仍然堅持自己的「理性變革」立場，反對「意識形態政治」的烏托邦傾向，並確認他所信奉的是一種以公民政治與科學態度為基礎的「經驗烏托邦」——因為「通往上帝之城的階梯不是由信仰築成，而是經驗的鋪墊」。¹⁷

面對六十年代後期興起的激進運動，貝爾先是告誡青年勿「將思想當成世俗宗教」，以免引起「社會動亂和暴力行徑」。¹⁸繼而在新左派學潮的猛烈衝擊下，以及在有關現代主義反文化的爭辯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深沉冷靜的「文化保守主義」意識。¹⁹

貝爾的這種保守意識與其說是一種立場遷移，不如說它補充並堅定了他原有的多向批判和「有選擇地反叛」立場。²⁰隨著年齡與地位上升，他已經站在思想精英和文化監護人的位置，對大眾文化和平民「解放」運動採取嚴峻的審查態度，並有意承擔對自由主義改革哲學的自我批判任務。從他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揭露針砭，以及注重信仰和權威，維護文明的延續等觀點來看，貝爾的文化保守主義更多地傳達出他對歷史的參悟及一種已臻成熟睿智的思想境界。近年來，他非但不因其「文化保守主義」而感到自相矛盾，²¹反而抓緊時間，集畢生精力，要在他多年堅持的三位一體思想原則基礎上，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終結論」、「後工業化社會論」和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批判上升改造成一個囊括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綜合理論體系。

跨學科研究方法 貝爾的理論之所以引人矚目，不僅因為他在思想結構中揉合均衡了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異體合成」(Syncretism, 指哲學或宗教上的諸說、諸神混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蓄意打通不同學科壁壘，以思想大家的恢弘氣度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與未來施行綜合研